

信用危机的社会性根源

翟学伟

内容提要 有关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讨论大都在不同的学科中进行,但其社会整体性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中国社会信用危机在总体上根源于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是认识现代社会不同发展方向的一对概念。以这对概念来重审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与方面所呈现的数据与案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化以来,由社会进化论本土化所体现出来的竞争法则被中国民众普遍认同,导致了中国社会价值与运行中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来推动社会的同质化进程,最终导致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方面都丧失了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比较异质性社会的特征,改变之法在于以任何手段来增强社会公众的判别力。

关键词 进化论 同质性社会 异质性社会 区分度和纯粹度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10023

一、引言

目前关于中国的社会信用状况,最常见的提法是“信用危机”。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并无异议,可见这是一个共识。当然,有共识并不意味着各方意见一致。要说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别,更多的在于各个学科对此都有自己的答案。比如研究公共政策的与研究经济学的思路不同;研究伦理学的与研究法学的结论不一样,研究政治学的与社会学的观点迥异。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首先,伦理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道德滑坡或道德沦丧成为一种常态,所以需要提高道德水平或加强思想教育。这个观点最容易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似乎有找回或重建中国国民道德素养的意思。

其次,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中国人不守信用,主要表现在商业领域中,诸如政府或企业的三角债,银行的坏账、烂账,工厂或工程拖欠工人工资、各个公司、部门之间打白条、其他如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现象均非常严重。所以市场秩序需要整顿治理,产权要明晰,或建立“社会-政府”二元结构,增强企业流动性平衡等,或要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征信制度,要综合治理等。

再次,法律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国的法制不够完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无法可依;

本文系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批号 09&ZD055)阶段性成果。

取信还是守信： 一项有关中国企业信用建立的个案研究

黄晓晔

内容提要 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关系本应是双方在制度中依照相关规定进行的互动与博弈,企业信用的重点是守信。但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企业信用的建立往往是人应对信贷制度而使用的策略。企业主通过“关系运作”,采用借、分、转、存、增等技术来构建起企业与银行的信用关系。在这一系列的策略中,企业信用的重点是取信于个人而不是制度。由此,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也转变成了个体行为和制度之间的博弈。策略的使用可引发回报需求,但也易导致信贷风险。而这样的风险既可能转嫁给社会,又有可能一直隐匿于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关系之中,或随时发生风险。

关键词 取信 守信 “关系” 信用策略

黄晓晔,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10098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210000

一、研究视角的提出

“信用”一词最初是在道德范畴中讨论的。在西方,相关问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说信用即“普遍道德”^[1]。由于守信是人的本分,是市场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信用作为一种问题的显现是与市场发展不同步的,即市场经济越发达,信用就越重要。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以家族和村落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熟人社会里,信用也相对隐而不显。即对于一个家族和村落来说,人们的所有信息是完全公开和全方位流通的。今天,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范围由固定转向流动,信息由完全的公开变得不够充分,原本在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自在不察的“信用”也将随之出现问题,并造成了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中本不需要强调的信用问题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项目号:09&ZD05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撰写得到笔者的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1]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Skinner, A. (ed.), Baltimore: Penguin 1979.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佟 新 刘爱玉

内容提要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 2010 年全国获得的 1870 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关键词 政治精英 晋升情况 性别比较

佟 新、刘爱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00871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一种性别视角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精英^[1]是如何得以晋升的?其晋升的路径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特别关注有哪些因素作用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

政治精英是指在各级党政管理系统中担任领导岗位的人,这些领导岗位是由一整套从科级到处级再到局级和部级的职业晋升链条,每一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并具有相关的权力、工资和福利待遇。对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晋升的相关研究认为,政治精英的升迁与其以学历为主的人力资本有关,学历越高,其升迁的可能性越大(Lee,1991);教育对精英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上升(Walder,Li and Treiman,2000),但家庭出身起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Walder

本文系 2010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及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编号 10JZD0045-1)、2011 年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编号 10@ZH020)阶段性成果。

[1]本文使用政治精英的说法来展开讨论,在我国,对政治精英的研究亦可称为对人才、干部、官员的研究。

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

——一个引入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

罗家德 方震平

内容提要 本文的主旨是在中国乡村社区的环境中提出一个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方法,希望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维度,包括关系、结构与认知三个维度,讨论了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在对汶川震后乡村社区调查数据分析后,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到了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指标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现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相互影响,而前者对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后者则没有影响。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社区社会资本 集体社会资本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00084

方震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建构一个测度社群内部“内聚力”的指标——社群社会资本,我们引入了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进行研究。在衡量社群社会资本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社群(community)这个概念。“community”有时被译为社区,即有“地域性”的意涵,而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社群”则跳出了空间的局限,更能面对相应社会文化情境下呈现出的问题(下文在专指地理性社区时以“社区”表示,非专指时都以“社群”表示)。community一词早在十四世纪就出现在英语中,是指平民或组织性的团体。十六世纪时,衍生出了共同体的意涵,如利益共同体等。十九世纪起,又有了当下性和区域性的感觉,于是社群一词,被用来表示直接的、全面的和有重要意义的关系,与形式的、抽象的和有工具性关系的社会(society)相对应(Williams, 1976)。之后滕尼斯首次提出并系统地阐释了这个概念,他抽象出了德文Gemeinschaft(即community)的本质——以血缘、地缘或信仰为连接纽带,将社会团结作为社会联系和组织的方式(滕尼斯, 1999)。从德文中的Gemeinschaft到英语里的Community,再到中文的“社群”,都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隐于其中。贝尔(Bell)在《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中,将社群区分为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地区性社群”,共有一个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历史的“记忆性社群”和为信任、合作与利他主义意识所支配的、面对面的有人际交往的“心理性社群”(贝尔, 2002)。

为什么衡量社群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呢?社群作为一个共同体,往往具有共同的利